

北部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对外文明交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白爱萍 廖国一

北部湾，东临中国广东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临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西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南与南海相连，拥有广阔的海域和海岸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广西北部湾地区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吸引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北部湾海域早在中国古代就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华文明与对外文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追溯历史，探讨北部湾在中国古代对外文明交往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仅望能对当今北部湾的发展有所启示。

一、汉唐时期，北部湾海域内联中原、外通海外诸国

早在远古时期，居于岭南地区的古越人就在北部湾依山傍水，进行着渔业、农业生产活动。自秦汉以来，北部湾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各朝统治者所重视，在我国汉唐时期起到内联中原、外通海外诸国的作用。

1. 海上丝绸之路合浦生辉，北部湾海域成为中原王朝由南方出海的必经之路

北部湾在汉代是汉朝的领土。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王朝在平定割据的南越国后，在岭南设置了零陵、南海、苍梧、郁林、象郡、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其中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位于今天的北部湾，汉时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来往多经过这些地方。

作为汉代合浦郡治所的合浦，在当时已成为北部湾沿海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发轫于秦汉，延绵两千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合浦港，地处北部湾畔，位于南流江入海口，地势平坦，海域宽阔，在汉唐时期是北部湾海域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经由合浦港，北部湾海域成为中原王朝由南方出海必经之道。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

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这是史籍中关于汉代北部湾沿岸地区至东南亚、南亚等地之间存在着一条远洋贸易航线的最早记载。它写明了出使的目的、起止点和途经的国家和地区名称及每段航程所花的时间。这条远洋贸易航线以丝绸贸易为主，故又称“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贯通海内外的主动脉，北部湾海域把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西南地区，中原王朝与海外各国联系起来。

(1) 北部湾海域的合浦港是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联系的重要通道。

一般认为，在秦统一岭南以前，岭南和中原已经有了联系^[2]。秦朝统一后，秦始皇为了开发岭南地区，派出秦将史禄率军队在今广西桂林市兴安县越城岭开凿灵渠。灵渠的修通，沟通了珠江水系的漓江与长江水系的湘江等，开通了由湘江经灵渠南下今北部湾合浦的交通路线。汉武帝再次统一岭南以后，建立了一条从中原地区可直达北部湾沿岸的合浦港出海通道，岭南与中原的联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

汉武帝时期到东汉末年中原地区与合浦郡的出海通道贸易路线大致如下：从徐闻乘船至合浦，再从合浦溯南流江北上，换乘车马经玉林平原，入绣江（又称北流江），出浔江，抵苍梧（今梧州）后逆桂江（漓水）而上，过灵渠，达湘江等长江水系，再辗转长安或洛阳。自秦凿通灵渠以后，中原产品输入北部湾沿岸及海外，大都走这条路线^[3]。

汉代，从北部湾输往中原的产品，既有经海上丝绸之路外来的犀、象及异物等，也有为中原人喜爱的北部湾地区家喻户晓的合浦珍珠、荔枝和龙眼等。从中原地区输入北部湾的产品，主要是生产工具和马、牛、羊等牲畜。据前述《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朝船队从合浦、徐闻带往海外进行贸易的物品有黄金和丝绸等，

这些黄金和丝绸来自中原地区。另外，在今北部湾合浦县堂排4座西汉晚期墓葬出土的大量器物、防城港市万尾岛汉墓发现的铜镜及五铢钱等物与中原内地汉墓出土的器物大多相同，被认为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产品^[4]。这些都是岭南地区通过北部湾海域合浦港与中原地区联系的见证。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部湾地区仍为南方重要之地。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我国北方全面混战，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而处于南方的北部湾合浦、交趾等郡独免兵祸，得到较稳定的发展。当时交趾郡太守士燮、合浦郡太守士壹，治理合浦、交趾“四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咸蒙其福”^[5]。于是，中原有识之士鉴于当时合浦港交通的便利，纷纷迁往北部湾海域的合浦，带来中原先进的文明，促进了北部湾地区的发展。晋朝时，晋武帝同意太守陶璜关于允许老百姓除了按额上贡好的合浦珍珠外，其余的可用于从事贸易的奏章。由此，中原和浙闽沿海等地的商贾纷纷前来北部湾合浦地区买卖南珠，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往更加频繁起来。隋唐时期，统治者仍然把北部湾海域作为岭南与中原沟通的要地。隋朝时，北部湾港口主要埠地由旧州（今浦北境内）逐渐移向海门（今廉州镇至北海港一带）。由于合浦县“扼塞海北，远镇交南”，隋统治者便把它作为经略海外的基地^[6]。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兵从北部湾合浦出发，大败林邑（今越南中部），为北部湾沿岸的发展营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唐朝时，合浦郡改称廉州。这时的合浦港不设置市舶使，课税低，并且桂东北兴安县的灵渠得到了进一步的修缮，水上交通更为畅达，合浦的采珠业也非常兴盛，这些有利因素，吸引了大批中外商人的到来，促进了合浦港的发展。此时，合浦港虽让位于广州港，但仍不失为岭南一大港口都会^[7]。当时，廉州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而且是珍珠的产地。在唐代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南流江后，南流江及其出海口（今北海港一带）是我国对交趾的水上要道，“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异时安南舟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8]。可见，当时廉州一带交通的便利，北部湾海域依然不减其沟通岭南与中原的作用。

与此同时，汉至唐各朝被流放、贬谪的贵族、官员，大批北方农民和商人大量流入北部湾地区，给北部湾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为北部湾地区的经

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通过中原地区与合浦郡的出海通道贸易路线，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人民得以频繁往来，这对加快北部湾地区的开发，进而带动整个岭南地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北部湾是沟通西南地区与海外联系的桥梁。

北部湾沿岸地区面临太平洋、背靠大西南这一区位优势，使其成为连接西南地区与海外的重要区域。

汉时，北部湾沿海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红水河（古称牂牁江）。汉代牂牁江下游连接今黔江，经浔江到达苍梧，再从西江可直达番禺（今广州）；从苍梧上溯至今藤县绣江（北流江）口，再南下玉林平原，然后转入南流江到达汉朝北部湾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合浦^[9]。云南、贵州乃至四川的货物当时均可经此道输出海外。例如，云南著名的茶叶，四川的蜀布、蜀锦、蜀绣、枸酱、邛竹杖，湖南的湘绣、湘莲，等等，通过水路不断运到合浦港，远销国外^[10]。

汉代合浦港既然可出到海外各国，那么巴蜀地区的货物在当时应该可以由北部湾合浦港出发经北部湾海域远送到南海诸国。通过北部湾的合浦港，内可联西南内陆，外可通海外诸国，形成了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格局。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北部湾地区与西南地区的交通业随之繁忙起来。进入唐朝，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较为发达，中央王朝致力于向周边地区拓展，对交通路线的开辟、修缮和管理尤为重视。在此形势下，岭南和西南的交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1]。交通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之间的交往，也促进了西南地区通过北部湾海域与海外诸国进行联系。

(3) 北部湾是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国际通道。

北部湾宽阔的海域使这一地区成为沟通我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国家的海上国际交通要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国商人或使团由北部湾海域的合浦港登陆，沿南流江直上就可直抵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商人或使团也可经过上述地方，由北部湾海域扬帆，到达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国家。北部湾海域是各国间往来的国际通道。

根据前述《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可知，汉武帝时已由官方派出使者，带上翻译和应募的商人，从合浦港等地乘船出发，远航至东南亚、南亚等地，进行友好交往和贸易。

据考证，前述《汉书·地理志》中的“都元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邑卢没国”“湛离国”和“夫甘都卢国”，是我国目前有关缅甸的最早记载。“黄支国”是印度属国，位置在今印度南部的康契普拉姆，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与货物集散地。“皮宗”，一般认为是今新加坡西面的皮散岛。新加坡位于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的要冲，汉代合浦郡与印度等国之间的远洋贸易航线必定经过这里，同时它也是汉朝—缅甸—印度的中继站。“已程不国”，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是今南亚的斯里兰卡。斯里兰卡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西汉时期中国与印度洋上国家的贸易，一般至此而返，这是从合浦郡出发的西汉海上丝绸之路所到达的最远的国家^[12]。汉朝出使者到达这些东南亚国家，北部湾海域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

随着汉王朝的出使及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东南亚、南亚及西方地区的一些国家也纷纷从海上丝绸之路，沿北部湾海域，通过合浦港进入中原，与汉王朝建立直接的贸易、朝贡关系。如《汉书·地理志》载：“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令遣使来献犀牛。”^[13]《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顺帝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14]据考证，叶调国即爪哇，属印度尼西亚。这种情况反映，到了东汉，印度尼西亚也来汉朝进行“朝贡贸易”了。永元六年（94年），缅甸北部的掸国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15]。《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89-105年）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16]这说明印度起先（89-108年）同我国友好往来是走西域丝绸之路，后因“西域反畔（叛）”，这条陆路受阻。从公元159年起，就改走海路，而且“频从日南”，可见印度不止一次从海路经过日南（今越南）来中国^[17]。永建六年至汉安三年（126-144年），中原商贾经南流江水路，交趾郡商贾沿海上和陆路，纷至合浦，以米易珠^[18]，这是当时越南商

人经北部湾沿海到合浦贩珠的记载。《后汉书·大秦传》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19]“大秦”即古罗马帝国。这说明，东汉时，始于北部湾合浦郡的远洋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延伸到了西方的罗马帝国。

另外，在今印度尼西亚东苏门答腊岛帕塞马高原巨石文化遗迹中，发现了西汉的雕像和浮雕。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的古代墓葬，出土有铭文为“初元四年”（前45年）的汉代陶鼎。当时的航海者在新加坡还留下了汉代的遗物，如现在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内陈列有一件当地出土的典型汉代罐鼓，是汉文化随远洋贸易船队传播到那里的历史见证。20世纪40年代法国考古队发掘了扶南（今柬埔寨）最早的哥俄厄港，发现了公元150年前后的罗马徽章和东汉中国的铜镜等，反映当时的罗马帝国商人沿海岸东来中国已是可靠的事实。在西亚的叙利亚（汉代时属罗马帝国）东部沙漠中的绿洲帕尔米拉境内出土了汉字纹锦，这些属于1世纪的丝织品，都是从汉朝输入的^[20]。

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发现了不少汉代钱币。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的古代墓葬，出土了汉代五铢钱。在越南发现的汉代钱币包括汉文帝四铢半两钱、西汉五铢钱、东汉五铢钱、汉宣帝小五铢钱以及王莽时期的“契刀五百”“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钱币。在广平省的汉墓中也发现了五铢钱和铁器。这些钱币反映了交趾三郡的设置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大量两汉王朝的铜钱得以进入越南地区的流通领域，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目前在环北部湾地区的合浦县和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发现的汉代铜钱，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最早传到东南亚的货币，这一观点不容置疑^[21]。

汉时出海的使者是携带“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这些黄金、铜钱以及琉璃珠、琥珀、玛瑙、水晶等物在今北部湾合浦汉墓中有大量的发现，这进一步证明了当时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往来。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北部湾海域经东南亚延伸到南亚，乃至延伸到地中海沿岸，把亚洲与欧洲联系起来，促进了国与国间的贸易往来及友好交流。

自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北部湾海域合浦港仍为中国南方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海外诸国的商人及外交使者入中原必经过合浦港。

三国时，我国开辟了经东南亚穿过印度洋，从波斯湾或红海抵大秦（古罗马帝国）的海上航线。与此同时，古罗马商人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然后经合浦港口，从南流江水道北上抵中原^[22]。所以，海外诸国与中国往来所走路线也多跨越北部湾海域。

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年），罗马商使秦论就通过交州来建业拜见孙权，讲述了与中国通商的愿望。此后，在公元3世纪二三十年间，孙吴曾遣宣化从事朱应和中郎康泰等人航海前往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等国访问。“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归国以后，朱应写了《扶南异物志》，康泰写有《吴时外国传》等书，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关于南海情况的专门著作^[23]。两人的出访，不仅是为了与这些地区进行政治联系，而且是为了开展贸易活动。

自从朱应、康泰两人出访后，扶南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国的往来，外国朝贡及商贾来中国由北部湾海域登陆的络绎不绝。南朝时，林邑、扶南等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往来十分频繁。林邑国南朝初期虽然“频遣贡献”，但同时又在海中劫掠商使，阻碍中外海上交往。宋文帝于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派兵攻讨林邑，林邑失败，臣服于宋，刘宋随即恢复了与林邑的通商贸易关系，此后南朝宋孝建、大明、泰豫年间林邑数次遣使入贡。齐武帝时，林邑商人经交州、合浦与我国中原进行贸易来往，络绎不绝，其国王为了增进与中国的友好，经常派遣使者前来朝贡^[24]。梁时，林邑于“天监九年（510年）、十年（511年）、十三年（514年）累遣使献方物……普通七年（526年），王高式胜铠遣使贡方物。大通元年（527年），又遣使贡献。中大通二年（530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陀跋罗摩遣使贡献……六年（534年），又遣使献方物”^[25]。晋武帝太康中，扶南国开始遣使贡献。梁朝时，扶南连年入贡，从梁天监二年至大同五年（503-539年）间，扶南商使来中国达9次之多。

此外，在马来半岛顿逊国以南有狼牙修国（今泰国北大年）、盘盘国、丹丹国，自南朝初年开始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盘盘国在宋文帝元嘉至孝武帝孝建、

大明中，遣使贡献；到梁时，交往更加密切，中大通元年（529年）五月，盘盘国多次遣使至梁贡象牙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今苏门答腊岛上的干陀利国在宋孝武帝时，“王释婆罗那怜陀遣长史竺留陀献金银宝器”^[26]。中国朝廷回赠给这些东南亚国家许多物品。天竺自从东汉遣使到中国以后，同中国的政治联系中断了3个多世纪，到梁朝又遣使节来华，恢复了彼此之间的政治联系，而当时贸易关系一定也得到了发展^[27]。

《梁书·诸夷传》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28]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我国自西晋以来与南海诸国间的往来不断发展。据统计，梁代每年接待的外国商舶约在十余批^[29]。从三国至南北朝期间，北部湾沿岸的合浦海陆交通发达，南海诸国来中国朝贡和通商，可经合浦溯南流江北上中原。

如前文所述，隋统治者因北部湾合浦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对外交往的基地。隋朝大业年间，隋使屯田主事常骏和王君政自南海乘舟出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归国时，赤土国遣使者与隋使一起“循海北岸，达于交趾”。海北岸即今北部湾北边。当时，东南亚的林邑、赤土、真腊和婆利等国，大都经今北部湾，沿合浦南流江北上中原与中国进行交往。

唐代南流江及其出海口（今北海港一带）是我国对交趾的水上要道，节度使高骈还疏通了自钦州、廉州到达越南北部沿海的海道，可谓“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中载：“乾符四年（877年），占城国进象三头。”占城国在今越南中南部^[30]。《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记载：“林邑国，汉日南象林之地……武德六年（623年），其王范梵志遣使来朝。八年（625年），又遣使献方物，高祖为设《九部乐》以宴之，及赐其王锦彩。贞观初，遣使贡驯犀。四年（630年），其王范头黎遣使献火珠……五年（631年），又献五色鹦鹉。……此后朝贡不绝。”^[31]此外《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还记载婆利国、盘盘国、真腊国、陀洹国、诃陵国、堕和罗国、堕婆登国等东南亚国向唐朝的多次朝贡。

另外，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第一次遣使节来唐并进行国家间的

易货贸易^[32]。大食国即今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商人运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象牙、珠宝和香料。仅据新旧《唐书》的统计，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间，大食国派遣的政府使团进行访问和官方贸易的即达37批^[33]。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跨洲越海，促进了彼此经济的发展。阿拉伯商人除了运来本国货物外，也带来非洲及印度洋沿岸的香料、象牙，大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唐代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中载：“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35]末罗国和缚达城分别是今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巴格达，可见唐朝时我国贸易已深入到西亚波斯湾沿岸。此外，波斯国“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772-747年），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35]。这些海外诸国“朝贡必由交趾之道”，又“当时之发航地，首广州，次交州，偶亦为今合浦境内之旧治，与钦县境内之乌雷”^[36]。可见，这些来朝贡和贸易的东南亚、南亚及西方国家的商船和使者都是经过北部湾海域进入中原的。

上述资料表明，汉唐时期，自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合浦港成为始发港后，中原地区和海外各国交往频繁。通过今北部湾，远洋贸易范围可以横贯东南亚、南亚和西方的不少国家，海外诸国亦可将一些本国特产源源不断地进贡给中国皇帝，皇帝受礼后则赏赐给他们一些高级的中国物品以示回报。通过北部湾这一国际通道，这种“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交往形式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2. 北部湾是汉唐王朝的军事要域，在维护南疆安全与稳定中有着重要作用

在军事上，今北部湾合浦自古为兵家要地。通过南流江流域既可运兵，也可运粮至合浦，而且经南流江而下，出合浦港，可达交趾等东南亚国家^[37]。

汉时，统治阶级对交趾用兵，均沿北部湾海域西行过钦州湾北岸到达今越南北部。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至（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42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38]马援率军征战交趾，便是从合浦港出发，当时合浦已成为南方海上运输中心，稳定了汉王朝的南疆。马援南下的行军路线，

在史书上虽无详细记载，但从兵源征集的地区分布和当时的交通状况来看，是从湘江水路经灵渠转入漓江，沿西江经南流江汇至合浦^[39]。至今在北部湾地区的一些地方留下了许多祭祀马援的伏波庙及有关马援行军经过的传说，在防城港一带还有许多“马留人”存在。

三国吴永安七年（264年）起，连续近30年，交趾多次出现叛乱，东吴五官中郎将薛综和刺史吕岱带兵3000多人，南下合浦，再攻交趾叛军。西晋泰始四年（268年），晋交趾太守杨稷派毛灵、董元攻合浦，在古城大败吴兵，杀吴交州刺史刘俊、都督修则。泰始七年（271年）四月，吴交州刺史陶璜等率兵10万由合浦海道突袭交趾，俘杀杨稷、毛灵，收复被晋军所占之地。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因林邑侵占日南郡象林县，朝廷派遣刘方和宁长真率军从合浦发船出海口，取道今越南中部大败林邑。唐懿宗年间，岭南西道节度使高骈于海门镇（廉州）屯兵3万，发兵击南诏^[40]。

汉唐时期的几次军事行动都经过北部湾海域，可见，汉唐时期北部湾区域在整个岭南占有极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它在中央王朝加强对岭南的统治及维护南疆的安全和稳定中起了很大作用。

3. 北部湾在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中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北部湾海域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前沿，在与各国进行贸易往来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他们的文化，承担起使外来文明进入中国的纽带作用。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从公元前3世纪起，佛教在南海、西域各国广为传播。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汉地，当在西汉之际，即公元前后^[41]。当时印度进入中国的通道有西域道及南海道两条。交通既不限于一道，佛教输入之地则不应仅由西域一途。“当纪元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必经。一六六年大秦帝安敦之使臣，即由交州登陆。三世纪初年译经建业之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二二六年大秦人秦论所抵之地亦为交趾。二五五或二五六年所出《法华三昧经》，亦在交趾翻译。二世纪末年黄巾之乱，独交州差杂，与夫商业之盛，有所记录，自亦为意中必有之事”^[42]。由此可知，南海一道为佛教输入的要道，而交趾、南海之通道位

于北部湾海域，可见，佛教进入中国是经过北部湾海域的。另外，在北部湾合浦县堂排4座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琉璃珠（玻璃珠）1656粒，玛瑙珠13枚，琥珀6件，水晶19件，金小坠珠4粒。这些物品中除金器外，皆极少见于中国其他省份的西汉墓中，专家们大多认为其应是外来的物品。这些物品应属佛经上记载的佛教“七宝”^[43]。在墓葬中还出土陶僧俑1件，这是随海船东来的僧人带来的。由此可知，在汉代，佛教已通过北部湾沿岸传入我国。

三国时期，据说当时著名的高僧康僧会是在交州（今两广及越南北部）一带出家学佛的^[44]。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更为兴盛。梁朝时，扶南连年入贡，并向崇佛的梁武帝赠送珊瑚佛像等佛教物品。“天监二年（503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天监“十年（511年）、十三年（514年），跋摩累遣使贡献”；盘盘国在“中大通元年（529年）五月，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534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丹丹国于中大通二年（530年）“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躯”给中国^[45]。南北朝时期，“南海交通之大港，要不交、广二州”^[46]。南海各国从南海向中国进献各种佛教物品，免不了要过交州，经过北部湾沿岸。此外，在今浦北县南朝城址中还发现了大量佛寺特有的莲花瓣纹的圆形瓦当^[47]。莲花是佛教经典和佛教艺术中经常出现的象征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可能已建有佛寺，足见佛教在当地已经得到一定的传播。

唐代，不少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僧人往来都经过北部湾海域。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益州“明远法师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原注：唐云思天），振锡南游，届于交趾，鼓舶鲸波，到诃陵国，次至师子州，为君主礼敬，乃潜形阁内，密取佛牙，望归本国，以兴供养”；“昙润法师，洛阳人也，渐次南行，达于交趾”；洛阳僧人智弘“与无行禅师同至合浦升舶……覆向交州，住经一夏，既至冬末，复往海滨神湾，随舶南游，至室利佛逝国”；“灵运师者，襄阳人也，梵名般若提婆。与僧哲同游，越南溟，大西国，于那烂陀画慈氏真容，赉以归唐”^[48]。《求法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所载往来之僧人凡四十人，其中：义净发自广州，历佛逝、末罗瑜、羯荼、裸人、耽摩立底；智弘发足

合浦，暂住交州，复历佛逝、末罗瑜、羯荼、那伽钵直那等国。又据诸传综考当时之发航地，首广州，次交州，偶亦为今合浦境内之旧治，与钦县境内之乌雷^[49]。从以上几则材料看，往来南海的僧人经过的地点有广州、交州、合浦、钦州等地。可见，这些僧人去往东南亚所经过的路线，包含北部湾海域。

汉唐时期，佛教转入中国的路线大多数经由日南、交趾、合浦等北部湾沿岸。佛教文化的传入，对岭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后来佛教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北部湾海域在佛教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纽带作用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自汉朝海上丝绸之路辟合浦港成为始发港后，北部湾一带的合浦郡和合浦港便成为汉唐时期国内物资集散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通过北部湾海域，远洋贸易范围可以横贯东南亚、南亚和西方国家的大部分国家，北部湾海域在发展中西交通和贸易、交流文明方面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二、宋元时期，北部湾是南方的重要门户

宋元朝建立后，为维护中国边境的安定，统治阶级重视发展南方海外贸易。由于唐时对南流江的治理及钦廉沿海航道的开辟，使得北部湾海域钦廉一带优越的地理位置更加凸显，在宋元时期一直为统治阶级所青睐。为维护、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宋元统治阶级还在北部湾钦廉一带设有沿海巡检司、市舶司等管理机构，北部湾逐渐发展成为南方的重要门户。

1. 北部湾是中国与海外诸国政治往来的渠道

宋元时期，随着统治阶级安抚东南沿海一带动乱后，海外贸易得到了重视和发展，中国封建王朝同东南亚、南亚、西亚等海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的联系也异常频繁，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朝贡。

宋承唐制，合浦郡称廉州。当时廉州东南、西南皆临大海，因此中国王朝通过廉州海路可以和安南（今越南）往来。所以，宋初首先抵廉州与宋朝进行朝贡的是位于今越南中部的占城国。占城国多次派遣使者来中国进行官方贸易。占城国于“建隆二年（961年）曾贡方物，三年（962年）八月又来贡，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又进贡，有诏赐钱二千六百缗，其慕化抑可嘉也”^[50]。此

后，海外诸国纷纷来中国朝贡。

三佛齐（位于今苏门答腊岛）于宋建隆元年（960年）九月，国王悉利大霞里坛遣使来贡方物，二年（961年）五月复遣使进贡，三年（962年）三月又来贡，十二月又贡方物；至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遣詹卑国使来贡；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闰十二月又遣使入贡，五年（1090年）复来贡。注辇国（今印度半岛东南部）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遣使贡珍珠等。大食国（今阿拉伯）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十一月，遣使入贡^[51]。蒲甘国（今缅甸中部）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曾入贡。真腊国（今柬埔寨）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遣使入贡。据统计，宋朝时来朝贡次数比较多的国家有：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这些国家大多贡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驯象以及各种香料、香木等，大食还贡玻璃器、水晶、织锦等。宋王朝也多次遣使回访这些国家并为其册封王号等^[52]。元朝时招抚海外，各国亦进行朝贡。贡品主要为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等。其中，光香、泥香都出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遣使节往真腊（今柬埔寨），同行的旅行家周达观记下了当时真腊人对“唐货”（中国产品）的喜爱。在真腊人的物质生活中，“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江苏）锡腊”^[53]。可见，元时，中東两国往来频繁。

那么，当时这些海外国家是如何到达中国进行朝贡的呢？《岭外代答》载：“三佛齐国，在南海之中，诸藩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阁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54]又“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趾洋”^[55]。引文中的“交洋”“交趾洋”即今北部湾海域。当时来中国朝贡的国家是以位于今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为中转站，跨越北部湾海域而来的。元代出访真腊的周达观航行的路线也跨越北部湾海域，他“历闽、广海外诸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其境也”^[56]。

上述这些海外国家在宋元时期的朝贡既具有政治色彩，又是双方经济贸易交流的形式。通过北部湾海域，这种具有政治和贸易的双重功能的朝贡得以频繁的

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友好往来。

2. 北部湾钦廉一带是海外各国前来中国贸易和西南各省之间进行经济交流的平台

(1) 廉州港口是经济往来的中心及重要枢纽。

宋元时期，钦州、廉州的沿海港口成为降服占城、交趾的基地后，统治者把钦廉作为北部湾地区重要的军事基地，频繁的军事活动促进了北部湾海域上交通的发展。为了促进北部湾沿海互市，宋元两朝统治阶级分别在廉州沿海设置巡检司、市舶提举司，管理港口事务，廉州港口的对外贸易随之兴盛起来。

廉州在宋代成为广西漕运海盐中心，官府在白石、石康修建盐仓，屯贮海盐。“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州，后可以舟运”^[57]，盐商可以利用南流江水道把广西的海盐销往广西全境及中原。从宋代开始，海盐成为廉州最常输出的商品。到元朝的时候，廉州仍是广西漕盐枢纽，每年漕运额盐 3.5 万多引，余盐 1.5 万引^[58]。这时期，由廉州港出口的货物主要为南流江、钦江流域的稻类、豆类、桂皮、荔枝、龙眼等农林产品及钦廉沿海的珍珠、盐和海产品。这些物品主要销往广西境内及中原地区。从廉州港输入的东南亚货物主要有苏合油、光香、金银、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象牙等贡品或商品，输往东南亚的主要是当时已初具规模的合浦陶瓷器^[59]。

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岭南的产品及海外的贡品、货物通过廉州港口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不仅促进了北部湾海域运输和港口的繁荣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岭南和海外诸国及中原地区的联系。

(2) 钦州博易场是宋元时期南方最大的中越民间贸易国际市场。

为促进外贸交流，宋朝在钦州设置了博易场。钦州地靠交趾，又与海南岛隔海相望，有充足的香料来源，同时又是蜀锦最近的出海口，蜀锦蕃香交易动辄数千缗，这使它成为一个颇有规模的地区国际性市场^[60]。

海外诸国最常来钦州博易场进行贸易的主要是安南国。在宋代，安南已脱离中国内属而自立。《桂海虞衡志》载：“今安南国，地接汉九真、日南诸郡，及唐欢、爰等州。东南海，接占城，占城，林邑也。东海路通钦、廉，西出诸蛮，西

北通邕州，在邕州东南隅，去左江太平寨最近。自寨正南行，至枕榔花步，渡富良、白藤两江，四程可至。又自寨东南行，过丹特罗小江，自谅州入，六程可至。自右汪湿润寨则最远。由钦州渡海，一日至。”^[61]又“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相远。异时安南舟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廉之西，钦也。钦之西，安南也。交人之来，率用小舟。既出港，遵崖而行，不半里即入钦港。正史至廉，必越钦港。乱流之际，风涛多恶。交人之至钦也，自其境永安州，朝发暮到”^[62]。由此可见，当时北部湾海域的钦州海道是中国与安南国往来的捷径。

当时“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其国富商来博易场者，必自其边永安州移牒至钦，谓之小纲。其国遣使来钦，因以博易，谓之大纲。所贖乃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熟香、生香、真珠、象齿、犀角。吾之小商近贩纸笔、米布之属，日与交人少少博易，亦无足言。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63]。钦州场中，交趾用所捕获的鱼、蚌来博易场交换米、布；交趾富商和官方则出售金银、铜钱和各种香料、奢侈品，并贩来蜀锦出售。足见当时钦州博易场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南宋是广西瓷器外销的重要时期，当时广西瓷器出口有两条路线：一是沿郁江、西江东下到广州出港；二是到钦州或在博易场贸易或出海到交趾^[64]。

钦州博易场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贸易、交往的主要阵地。西南地区罗殿国（今贵州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内）、自杞（今贵州西南和云南东部）、毗那（今贵州兴义附近）、特磨（今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部）等居于广西和大理的通道上，这些少数民族群体通过贩马联系在一起，“往西则入云南贩马，往北则入四川博易，往南则广西交易，云、贵、川、广通过买马而连成一气”^[65]。通过进行贸易，从前各民族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各民族间在经济交往中彼此交流，共同学习，对促进经济联系及加速边疆生产发展及稳定起了推进作用。

总之，通过北部湾，宋元时期海外诸国与中原、岭南、西南民族间得以互相往来，这就极大地发展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加强了岭南与西南民族间的联系与团结，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南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给宋元政府集中精力解决北方争端提供了一个繁荣、稳定的后方。北部湾在此时作为南方重要

门户所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

三、明清时期，北部湾光彩依旧，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明清厉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给海外贸易带来了许多困难和不便。但这对当时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发展并未造成多大影响，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在前代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不少私商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突破海禁的限制，到东南亚各国从事走私贸易，北部湾的海上交通路线不改作为中国与海外各国往来的桥梁作用。

1. 北部湾仍为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桥梁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设廉州路府，并显耀国威于安南、占城两国。于是，安南、占城派使者“北直廉州，循海北岸”前来进贡。海北岸，即今我国北部湾北岸^[66]。可见，通过北部湾海域，中越两国仍能进行贸易往来。

明朝政府鼓励海外国家以“朝贡”形式来华贸易，规定“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场其税”，因此，东南亚国家借以“朝贡”的名义频繁地派船到中国。以暹罗（今泰国）为例，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明初洪武三年至洪武三十一年（1370-1398年）海禁最严厉的时期，暹罗派船入明朝贡达35次，平均每年一次多。而至明代后期，隆庆元年（1567年）开海禁后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的78年间，因准许国内私人贸易船到东南亚各地贸易，这样一来，东南亚国家就不必为获得中国货物而频繁派船入明“朝贡”，于是朝贡的次数大大减少，暹罗仅朝贡14次，平均五年半一次^[67]。

明代中国本着中柬友好传统，多次遣使访问柬埔寨。根据《明史》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和十九年（1386年）、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和三年（1405年），连续四次遣使多人访柬埔寨，而柬埔寨从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也派遣使团来中国朝贡达13次之多^[68]。

明初东南亚各国给中国的朝贡物品，绝大多数是香料，如越南贡物：金银器皿、薰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棕香、白绢、犀角、象牙和纸扇^[69]。而且东南亚各国贡献的香料数量异常之大，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爪哇的贡物中，有胡椒75000斤；洪武二十年（1387年）真腊的贡物中，有香料60000

斤，暹罗贡物有胡椒 10000 斤、苏木 10000 斤；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暹罗又贡苏木、胡椒、降真等物共 171880 斤。这些香料的输入，对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70]。

清初，在全面闭关时期，仍允许与越南有朝贡贸易。康熙二年（1663 年），越南的朝贡贸易，定为三年一次，到乾隆年间，又改为二年一次，越使采购的货物以丝织品为多。清朝与暹罗仍维持良好的关系，对暹罗的官方朝贡货物限定为三年一期，并准许暹罗使者可取海道到广东入京。广东西临北部湾宽阔的海域，暹罗的朝贡应该也跨越了北部湾海域。

明朝虽实行海禁，但东南亚等国的使者或商人仍可以通过朝贡的形式与中国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北部湾的海上交通路线依旧繁忙。

2. 明清时代北部湾中越交往频繁

中越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明朝以后，即使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措施，但并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两国百姓之间从事边境贸易活动。据日本学者山本达郎研究，尽管明朝与安南都在不同程度地实施禁海政策，但是两国海上贸易始终在秘密进行。中国商人常常前往安南的云屯港交易，而安南商人则主要来到钦、廉等州的港口进行贸易^[71]。

通过北部湾廉州一带，中越两国交往频繁。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由于来往廉州的外国使者和商贾甚多，明朝廷便在廉州置水路驿站，进一步加强对廉州海陆交通的管理。明政府还在廉州先后 18 次大规模采珠，钦州、廉州一带的陶瓷、珠宝等土特产常见于贡舶互市中。明中期以后，北海港已经开辟了与今越南不定期的交通航线，通过北海港，中越双方便可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72]。

清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并在北部湾沿海港口一带设置了许多炮台，引起了北部湾沿岸人民的强烈反抗。1669 年，清政府迫于阶级矛盾的压力，宣布恢复市舶课税，商人可以从事近海贸易。清朝为加强对港口的管理，在廉州设置海关，接着在北海设海关分卡。雍正年间，北海港与安南、暹罗等东南亚国家海上贸易往来频繁。出口以瓷器、铁锅、糖、茶叶、桂皮、桐油、牛皮、盐、海味和生锡为大宗，进口货物主要是呢羽、香料等，有时亦进口安南、暹罗的大米^[73]。

清代，廉州盐漕在广西仍占重要地位。乾隆十二年（1747年），合浦沿岸海盐田规模远胜于前人，年产熟盐930万斤以上，销往广西全境和云南、贵州、湖南部分地区。清初，南流江仍是中原出北部湾通安南的天然水道，外国商贾由北海港登陆前往中原的为数不少^[74]。清代从广西到越南北方的交通线可自廉州乌雷山发船，如顺着北风，一二日可抵交趾之海东府，沿海岸行八日，便会到达海东，那里有白藤、安阳、涂山、多渔等海口，各海口有支港以达交州^[75]。可见，清代中越两国商人跨越北部湾海域往来便捷。

另外，在军事上，明初明王朝征交趾叛寇，取道北部湾钦廉一带进行军事行动仍是便捷之径，因为“从钦、廉地方接近，水行通籐筏，若今军民相参馈运，则用力省而人不劳”^[76]。文化上，廉州曾经在康熙年间收得一越南昭光寺钟，而越南陈朝又曾经在廉州修建东山寺。这表明14世纪廉州与越南沿海在佛教领域曾经有过密切的交流，这是廉州与越南北部进行文化交流的明证^[77]。

可见，明清虽然为保护海疆实行海禁，对海上贸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它却不能完全切断国内私商到海外贸易的途径，也不能阻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发展、文明的交流。中国商人与东南亚各国商人不顾严厉的海禁律法，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各种对外贸易机会。而位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北部湾在这一时期顺应了中外商人的要求，发挥了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沟通内外的纽带作用，为来往的中外商人提供朝贡、贸易的便利交通枢纽，同时也为在鸦片战争后开埠的北海港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北部湾自汉代以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内可联系中原，外可与海外诸国相通，在与外来文明交往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历史步入近代时期，并为后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交往提供了基础条件。回顾北部湾在古代对外文明交往的历史，对于当今这一区域的开发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汉]班固. 汉书:中册[M]. [唐]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5:1330.

[2]廖国一. 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M]//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合浦海上丝绸

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69.

[3] 廖国一. 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M]//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69.

[4] 廖国一. 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M]//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71.

[5]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 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8.

[6]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 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9.

[7] 廖国一, 曾作健. 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J]. 广西地方志, 2005: (3).

[8] 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53.

[9] 廖国一. 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M]//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82.

[10] 邓家倍. 再论合浦是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M]//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93.

[11] 李富强. 西南便捷出海通道的时空变迁[M]//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239.

[12] 廖国一. 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M]//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65-167.

[13] [汉]班固. 汉书: 中册[M]. [唐]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330.

[14] [宋]范晔. 后汉书: 下册[M]. [唐]李贤, 等,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916.

[15] [宋]范晔. 后汉书: 下册[M]. [唐]李贤, 等,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927.

[16] [宋]范晔. 后汉书: 下册[M]. [唐]李贤, 等,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916.

[17] 陈炎.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976.

[18] 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 合浦县志[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7.

[19] [宋]范晔. 后汉书: 下册[M]. [唐]李贤, 等,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974.

[20] 廖国一. 汉代合浦郡的对外贸易及其重要意义[M]//吴传钧.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165-168.

[21] 廖国一. 汉代合浦郡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古钱币考证[J]. 广西金融研究, 2005(S2).

[22]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 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8.

[23] 陈高华, 吴泰.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7.

[24]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 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9.

[25] [唐]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788-787.

[26] [唐]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793-794.

[27] 陈高华, 吴泰.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 [28] [唐]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783.
- [29] 沈光耀.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12.
- [30] [唐]刘恂. 岭表录异[M]. 鲁迅,校勘.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10.
- [31] [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5270.
- [32] [33] 沈光耀.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311.
- [34] 冯承均. 中国南洋交通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32.
- [35] [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192.
- [36] 冯承均. 中国南洋交通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44.
- [37] 廖国一, 曾作健. 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J]. 广西地方志, 2005(3).
- [38] [宋]范晔. 后汉书:下册[M]. [唐]李贤,等,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5:1916.
- [39] 潘琦. 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2:520.
- [40] 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 合浦县志[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1-4、81-103、300-304.
- [41] 廖国一. 佛教在广西的发展及其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J], 佛学研究, 2002:(11).
- [42] 冯承均. 中国南洋交通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6.
- [43] [44] [47] 廖国一. 佛教在广西的发展及其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J], 佛学研究, 2002(11).
- [45] [唐]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789-794.
- [46] 冯承均. 中国南洋交通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26.
- [48] 冯承均. 中国南洋交通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38-43.
- [49] 冯承均. 中国南洋交通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44.
- [50]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77.
- [51]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81-99.
- [52] 李云泉. 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3(2).
- [53] [宋]周达观. 真腊风土记校注[M]. 夏鼐,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148.
- [54]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86.
- [55]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126.
- [56] [元]周达观. 真腊风土记校注[M]. 夏鼐,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15.
- [57]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179.
- [58]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17.
- [59]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16.
- [60] 朱文慧. 试论宋代广南西路对外贸易的发展[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5).
- [61] [宋]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校注[M]. 严沛,校注.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162.
- [62]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53.
- [63]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196.
- [64] 朱文慧. 试论宋代广南西路对外贸易的发展[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5).

[65]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校注[M]. 杨武泉,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89.

[66]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 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17.

[67] 李金明: 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J]. 南洋问题研究, 1998(2).

[68] 沈光耀.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277.

[69] [清]汪森. 粤西丛载校注: 中册[M]. 黄振中, 吴中任, 梁超然, 校注.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7: 657.

[70] 李金明: 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J]. 南洋问题研究, 1998(2).

[71] 刘志强. 历史上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文化互动[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8(4).

[72]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 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18.

[73]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 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21.

[74] 黄铮. 广西对外开放港口: 历史·现状·前景[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22.

[75] 刘志强. 历史上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文化互动[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8(4).

[76] 李国祥. 明实录类纂: 广西史料卷[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371.

[77] 刘志强. 历史上廉州、钦州与越南北部地区的文化互动[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8(4).

(作者白爱萍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讲师; 廖国一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